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海外华侨与中国抗战： 北婆罗洲华侨筹赈祖国 难民运动探析（1937-1941）*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Campaig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North Borneo
to Raise Relief for Refugees in China (1937-1941)

张元
(ZHANG Yuan)

摘要

囿于资料所限,学界对于北婆罗洲华侨的筹赈运动极少述及。北婆罗洲华侨筹赈祖国难民运动是南洋华侨筹赈运动的一部分。北婆罗洲虽为小埠,但却涌现出了郑潮炯这样的筹赈运动先锋式的英雄人物,他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南洋筹赈运动的发展。北婆罗洲华侨人数虽少,财力也远不如新马等地雄厚,筹赈组织也存在着些许弊端,但在抗日宣传和筹赈募捐方面依然交出了堪称满意的答卷,与其他大埠相比也不遑多让。

关键词: 筹赈运动、抗日、华侨、北婆罗洲、郑潮炯

*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的意见和修改建议。本文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606310156）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委托课题“马来西亚广东华侨移民史”（GD16TW08-3）资助，为项目阶段性成果。

张元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E-mail: chinazhangyuan@qq.com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22

Abstract

Due to limited data,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relief campaig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North Borneo is rarely involved. The overseas Chinese relief campaign of North Borneo is a part of the movement of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relief campaign. Although North Borneo is a small country, there have emerged patriotic heroes like Zheng Chaojong who are pioneers in the fundraising movement, h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ief campaign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with his own efforts. Although th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in North Borneo is small, and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far less than tho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and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fund-raising movement, but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orth Borneo have still made satisfactory achievements in the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raising relief for refugees in China, compared with other big cities with a larger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also not inferior.

Keywords: Relief Movement,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verseas Chinese, North Borneo, Zheng Chaojong

一、前言

孙中山先生曾盛赞“华侨乃革命之母”，此言非虚。海外华侨虽然定居异乡，但仍心系祖国，除了支援中国的革命工作，华侨还积极捐献财物，支援中国的国家建设。故乡每遇天灾人祸，海外华侨均积极募捐，赈济灾民。“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在中国生死存亡之际，海外华侨联合起来，发起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筹赈祖国难民运动。学术界关于海外华侨与中国抗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范围大多集中于新加坡和马来亚、菲律宾及印尼，对于东马尤其是北婆罗洲极少涉及。¹ 北婆罗洲即现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素有“风下之乡”之美誉。² 北婆罗洲与中国关系源远流长，华侨很早就移居北婆罗洲，在当地留下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民间传说。华侨大规模移居北婆罗洲始于1881年北婆罗洲开埠之后，并迅速成为北婆罗洲人数最多的外来移民群体。囿于资料匮乏难寻，学界对于北婆罗洲华侨的筹赈祖国难民运动的研究尚处于空白，使人产生了北婆罗洲华侨对中国抗战漠不关心的错觉。³ 北婆罗洲筹赈运动的发展

及筹赈成效究竟如何，本文试以中文档案及报刊资料为基础，对北婆罗洲华侨筹赈祖国难民运动做一探析，以期抛砖引玉，正本清源。

二、北婆罗洲各地筹赈组织的建立

北婆罗洲华侨对中国的爱国热情与其他地区的华侨并无二致。1900年时，山打根客家侨胞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委托郑士良领导的惠州起义。

（Danny Wong Tze-Ken 1998：61）1906年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分会之后，南洋各埠爱国华侨纷纷响应，在各地成立书报社，作为革命活动机构和场所，北婆罗洲华侨亦未曾缺席。民国以前北婆罗洲就建立起了纳闽启文书报社和山打根中华书报社两个同盟会分支组织。（冯自由1930：136-137）山打根华社最高领导人时任甲必丹林文澄为同盟会元老，他于1905年就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同盟会在北婆罗洲的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下，山打根侨胞尤其是客家侨胞为革命运动积极奔走，在书报社进行演讲，为革命活动筹集资金。（Danny Wong Tze-Ken 1998：62）

1928年5月3日日军攻占济南，制造“济南惨案”，亚庇福建龙岩籍华侨章谦组织鲁案后援会，从事爱国活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3：135）实必丹埠救济团周春荣等人捐献国币880元。（中央财务委员会1928：183）山打根明新学校的学生也通过义演话剧的方式筹募资金，助力筹赈运动。（佚名1928：6）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尽数沦入日寇之手。章谦领导的亚庇他山俱乐部⁴即发表《宣言》，呼吁广大华侨进行抗日。（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24）同年，亚庇华侨发起组建亚庇救灾会，多次筹款募捐，赈济中国水灾，并接济东北难民及第十九路军，直到1933年4月才停止活动。

（卓还来1999：96）1936年6月，以孔祥熙、何应钦等人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高官以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大寿的名义发起了捐赠飞机的募捐运动，并组建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孔祥熙、何应钦、翁文灏、王晓籁、周至柔五人担任常务委员，（《福建党务月刊》1936：19-20）北婆罗洲华侨也纷纷积极响应。1936年11月委士珍埠启华学校发起购机募捐，筹得

国币317.79元。（《侨务委员会公报》1936b：42-43）1936年12月亚庇丹南埠闽南小学校董颜贵受、陈伯书、黄玉书捐献国币300元。（《侨务委员会公报》1936c：28）1937年1月亚庇保佛龙马旦埠华侨邓永利等人汇交献机款婆币24.5元（按当时汇率，折合国币46.3元）。（《侨务委员会公报》1937b：38）同月，亚庇中华商会也捐赠国币3500元（《侨务委员会公报》1937a：29-30），以示对中国国防建设的支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眼见中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海外侨胞纷纷行动起来，发起了波澜壮阔的筹赈祖国难民运动。1937年7月24日，山打根中华商会和亚庇中华商会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兵北上抗敌。（佚名1937：第2版）1937年8月14日，亚庇华侨首先发动起来，由亚庇中华商会出面，召集亚庇各华侨团体召开代表大会，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成立筹赈组织，支援中国抗战，为避免再次向北婆罗洲政府注册立案的繁琐程序，仍然沿用亚庇救灾会的名称。会议选举福建安溪籍侨商胡孝德为主席，广东清远籍华侨李德培为副主席，其他均为亚庇侨领。胡孝德经营布匹生意起家，后经营橡胶种植业，财力雄厚。对于筹赈工作身先士卒，不遗余力，因此在亚庇华侨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但因年事已高，亚庇救灾会日常会务实际由副主席李德培主持。李德培为土生华人，在亚庇土地局工作，虽然他从未回过中国，但爱国热情丝毫不减（卓还来1999：96）。亚庇救灾会的人事结构基本上囊括了亚庇所有有实力的侨领，有利于筹赈工作的顺利开展。受亚庇救灾会的影响，亚庇周边的小城镇如下南南、孟家达、打里朴、斗亚兰、京那律、吧巴、王家湾、王麻骨、丹南、保佛、根地咬、古打毛律等地也纷纷动员起来，这些城镇华侨人数多的有两千余人，少的只有两三百人，也先后成立了筹赈组织，沿袭亚庇救灾会的惯例，采用救灾会之名，这些组织均以亚庇救灾会马首是瞻。

几乎与此同时，北婆罗洲东海岸的华侨也行动起来，在中国国民党北婆罗直属支部和山打根领事馆领事吴勤训的提议下，山打根中华商会出面召集山打根各侨团和侨校代表召开紧急大会，成立北婆罗洲山打根中华商会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简称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山打根中华

商会2001：44）为免去注册备案的麻烦，山打根筹赈会挂靠在山打根中华商会之下，设主席、副主席、财政主任、会计主任、监委会主席各1人，执行委员29人，监察委员7人。（卓还来1999：95-96）主席由山打根潮州帮侨领、集隆号司理、山打根中华商会常委丘金钟担任，副主席一职由广东新会籍侨领吴社华担任，吴社华是英国夏利臣公司华人副经理，同时也是山打根中华商会常委。财政主任和会计主任分别由万和隆公司的东主关洛明和关济川担任，关氏家族祖籍广东南海（今广东佛山），其家族产业万和隆公司于1882年创办，是北婆罗洲历史最悠久、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华人商号，关氏家族长期把持山打根中华商会的主席、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在山打根侨社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关洛明为时任山打根中华商会主席，同时也是山打根慕娘电版印务公司董事长以及万和隆公司负责人之一，是关氏家族在筹赈会的代表。山打根筹赈会的人事安排是各方权力斗争相妥协的产物，为了加强对华侨社会和华侨团体的控制，国民党北婆罗洲直属支部在山打根筹赈会中安插了许多国民党员，其中党员梁子馨担任监委会主席，党员陈伯强担任文书，党员陈筱宝、麦显彰、陈昌盛、冯雅厅、李启迪、麦耀彰、谭时光、杨卓生、黄裳、霍持真等人出任执行委员，此外，还有一些党员担任干事。（卓还来1999：90）此前，国民党党部对侨社事务的渗透和控制已引发山打根侨社的强烈不满，此次再度插手筹赈工作，更使侨社领袖心有芥蒂，这或许是山打根最具影响力的万和隆公司关氏家族不愿出任筹赈会主席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山打根筹赈工作的成效。

此后，北婆罗洲各埠华侨筹赈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北婆罗洲境内，不论地方大小，凡是有华侨聚居的地方，均成立了筹赈会。到了1941年，北婆罗洲全境共有大小筹赈会20个，若加上部分地区的下属分会，总数达到30多个。具体情况统计如下：

表1：北婆罗洲华侨救国团体一览表（1937年—1941年）

地区	埠名	救国团体名称	成立时间	领导层
东海岸	山打根 (Sandakan)	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	1937年8月	正主席丘金钟（广东潮州人），副主席吴社华（广东新会人），财政主任关洛明（广东南海人）。
	斗湖 (Tawau)	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	1937年	主席林皇荣（广东宝安人），1941年改选后新主席为潘少廷。
	东谷 (Tungku)	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	1938年前	主席张廷卓
	拿笃 (Lahad Datu)	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	1939年前	主席吴奕孚
	西加麦 (Segama)	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	1938年前	主席杨三
	仙本那 (Semporna)	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	1937年底	主席卓观养（广东宝安人）
	古达 (Kudat)	华侨救灾会	不详	执委会主席徐辉资（福建永春人）

西海岸	亚庇 (Kota Kinabalu)	华侨救灾会	1937年8月14日	正主席胡孝德（福建安溪人），副主席李德培（广东清远人），第一届财政科长郑美川（福建永春人）。
	保佛 (Beaufort)	华侨救灾会	1937年8月20日	主席钟兆龙（广东花县人），财政詹行道。
	下南南 (Inanam)	华侨救灾会	1938年12月	主席王成基，财政陈成就。
	孟家达 (Menggatal)	华侨救灾会	1937年11月	主席曾玉，副主席李文龙。
	打里朴 (Telipok)	华侨救灾会	1937年8月	主席张恩崇，副主席陈必德。
	斗亚兰 (Tuaran)	华侨救灾会	1937年9月3日	主席罗道中，副主席赵及泉。
	京那律 (Kinarut)	华侨救灾会	1937年8月	主席冯华
	吧巴 (Papar)	华侨救灾会	1937年8月	主席马润才，副主席林宗麟，领导人之一曾耀南（广东五华人）为吧巴首富。
	王家湾 (Bongawan)	华侨救灾会	1937年8月	主席陈光史，副主席李佐廷。
	王麻骨 (Membakut)	华侨救灾会	1937年9月	主席卓秀（广东宝安人）
	丹南 (Tenom)	华侨救灾会	1937年8月	主席黄玉书（闽籍华侨）
	根地咬 (Keningau)	华侨救灾会	1937年9月15日	主席冯福海，副主席黄水可。
	古打毛律 (Kota Belud)	华侨救灾会	1937年10月	主席陈家铨

资料来源：卓还来1999：48-52、91-93、109-110。

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北婆罗洲华侨筹赈组织的建立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分别围绕东西两个经济中心建立起来的，西海岸以亚庇为中心，

东海岸则以山打根为中心，亚庇华侨救灾会由亚庇中华商会发起，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则由山打根中华商会发起成立，形成以两个中华商会为中心的权力架构，东海岸地区各团体称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西海岸各城市则称华侨救灾会。其中古达是个例外，古达在行政区划上属于东海岸省，但从其筹赈组织名称来看，显然古达与西海岸的亚庇联系更为紧密。

筹赈组织的领导层与各地华社领导层具有较高的重合性，担任筹赈组织领导之职的大多为当地中华商会的领袖人物或各方言群的侨领。按方言群来看，各筹赈组织的领导权全部被闽粤两省侨胞所垄断，在西海岸，由闽南人主导，在东海岸则以潮州人和广府人为主，客家人虽然人数最多，但由于客家人主要以务农为主，经济实力较弱，影响力不大，因此在山打根、亚庇等大城镇，客家人的影响力相对较弱，无法与潮州人、广府人以及闽南人相匹敌，但在客家人居多数的小城镇，客家人凭借人数上的优势，牢牢控制着华社及筹赈组织的领导权。“筹赈会中各人所占地位与其本身力量或不完全相称，惟大体而言，此间侨领大部均已网罗在内，表面上亦均和衷共济，工作亦颇努力”。（卓还来1999：96）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整个北婆罗洲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联合会或总会之类的组织，这些团体无论大小，均为独立机构，并无上下隶属关系，这对后续筹赈工作的开展相当不利。

三、筹赈工作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团结东南亚各地的爱国华侨，进一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在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的提议下，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华侨代表齐聚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总部设在新加坡，并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为副主席，各埠筹赈会认领常月捐国币400余万元。（陈嘉庚1946：48）其中，北婆罗洲义捐国币187800元，认购公债国币64500元。（傅无闷1939：辰175）此次大会，北婆罗洲地区仅有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派人出席，其他各筹赈会由于时间仓

促，未来得及派代表参加，报告转由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代宣读，此举本为权宜之计，由于山打根为当时北婆罗洲首府，南侨总会误以为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是北婆罗洲筹赈运动的最高权利机构，此后，相关的通知以及任务分配均通过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给筹赈工作带来巨大不便和困扰。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与其他各筹赈团体为各自独立的机构，在行政上并无隶属关系，所以并没有对其他筹赈团体发号施令的权力。南侨总会凡事只与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接洽，完全忽略了其他筹赈团体，使其他华侨筹赈团体感觉被冷落，打击了其他华侨筹赈团体筹赈的积极性。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接到任务后，也是左右为难，任务摊派数额多也不是，少也不是，唯恐引起其他筹赈团体的不满。故而，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曾致信南侨总会，禀明实情，请求直接分配各团体的具体任务及认捐数额，而南侨总会不知何故，对此充耳不闻，仍然如故，造成北婆罗洲筹赈工作效率低下，各团体各自为战，不能坦诚相对，同心协作。此外，南侨总会在统计筹赈组织名单时，北婆罗洲部分仅收录了山打根和亚庇两地的筹赈组织，这也大大打击了其他各埠筹赈团体的工作积极性。（许云樵1984：45）

1939年11月亚庇华侨救灾会为了集中力量，改善筹赈工作效率，联络北婆罗洲西海岸各筹赈团体，在亚庇召开了西海岸华侨救灾团体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西海岸华侨救灾总会。总会会员以团体为单位，凡是西海岸各区救灾团体均为总会会员。西海岸华侨救灾总会设置执行委员会，亚庇华侨救灾会的正副会长及各科科长、各区救灾团体的正副主席，各区出席首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自动成为首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最高权力机构是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设常务委员会，会议推选亚庇华侨救灾会副主席李德培为常委会主席，亚庇华侨救灾会主席胡孝德由于身体原因，仅挂名为常委会副主席。（卓还来1999：97）由此正式形成了以亚庇华侨救灾会为核心的西海岸华侨救灾总会，在西海岸华侨救灾总会的统一协调下，西海岸的筹赈工作有了很大改善。各埠捐款先汇交亚庇，再由亚庇统一汇往新加坡南侨总会。而东海岸始终没有进行整合，部分筹赈团体募捐的款项托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进行转交。

此外，国内团体和机关纷纷以宣慰华侨的名义，派员赴各地募捐，严重影响筹赈工作，“匪特于抗战建国无补事益，反足增重侨民负担”。

（福建省档案馆1990：1857）早在1932年时，侨务委员会就这一弊病提出政府各机关如派员出国从事侨务相关活动，应先呈请行政院交侨务委员会审查，以统一事权。（《侨务委员会公报》1936a：42）行政院虽下达了训令，但收效甚微，各种以“专员”、“宣慰使”、“侨务视察员”等名目滋扰华侨的活动仍然层出不穷，华侨不堪其扰，对南京国民政府颇有微词。1940年5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再次颁布训令：

“查国内各机关团体仍时有不遵……规定，擅自派员出国募捐之举，不独使侨胞感觉分歧，且易生其他弊端，兹特重申前令，凡未经本院核准，概不得派员出国向侨胞募捐。至国内各机关团体派遣人员赴海外各地从事救国工作，如组织社团、招募人员及宣慰考察等，为统一行动起见，应事先报告海外部。所派人员在出国前，并须亲赴海外部或该部驻香港办事处先行接洽，以便通知各该地党部予以协助及联络。”

（福建省档案馆1990：1858）

此举收到一定效果，但仍有许多机关及团体代表，甚至是社会知名人士持国民政府重要人士的介绍信到北婆罗洲的偏远地区募捐，这些私自募捐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北婆罗洲筹赈工作的开展。（卓还来1999：141）

四、抗日宣传工作的开展

除了筹赈工作之外，各筹赈团体还担负着抗日宣传工作。北婆罗洲发展水平较其他地方相对落后不少，故文化不发达，报刊书籍等大多依赖从新加坡和香港输入。北婆罗洲华侨受教育程度不高，加之北婆罗洲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不便，新闻闭塞，又有日本人及汉奸散布反动及假消息，蛊惑人心。因此加强对华侨民众的抗日宣传和教育，鼓励侨民抗战信心十分有必要。

宣传工作可分为文字宣传与口头宣传两种，文字宣传主要通过报刊、杂志等出版物进行宣传。此外，通过中国国民党创办的华侨书报社进行宣传。孙中山在南洋宣传革命思想时，在南洋各地发动设立书报社，宣传三民主义，启发民智，同时作为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在山打根创办有北般鸟山打根中华书报社，在纳闽文坡有启文书报社（蒋永敬1977：351），在保佛有憬然阅书报社，在亚庇有华侨书报社（卓还来1999：45），这些书报社类似阅览室，陈列宣传抗战的书籍杂志等刊物，供民众阅读。此外，有华侨及侨团每日收听中国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并记录下来油印，散发给侨胞传阅。由于北婆罗洲政府出版法令的限制，这些小报没办法公开出版，只能少量印刷，通过邮寄的方法，互通消息。通过此种方法，1936年华侨李玉龄在亚庇创办了北婆罗洲第一家华文报纸《华侨日报》（张元2017：136），1937年前后，山打根也创办了《华侨日报》，亚庇《华侨报纸》和山打根《华侨日报》的创办者均为中国国民党驻北婆罗洲直属支部党员。两份报纸均为两版，一面铅印广告，剩下一面油印新闻。（佚名1942：4）1937年亚庇华侨救灾会成立后，亚庇《华侨日报》即附设亚庇华侨救灾会宣传部之下，以推动筹赈工作的发展。各筹赈团体均附设有宣传部，每逢举办特捐会时，也会印发筹赈宣言，其中亦有许多有关抗战的宣传材料。此外，驻山打根领事馆定期油印抗战宣传材料及中国政府中央法令，免费分送辖区内各侨团、侨校及俱乐部等，1941年起还刊发公报，刊登各种文告消息等，也都起到了宣传教育的效果。（卓还来1999：102）

口头宣传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进行：首先是创办戏剧社，通过演出戏剧，或放映电影的方式，潜移默化，达到宣传目的。戏剧分为旧式戏剧和新式戏剧，旧式戏剧即中国传统经典剧目，新剧即歌剧、歌舞剧或情景剧等，题材大多取自抗战史实，内容壮怀激烈，易于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效果极佳。中国国民党北婆罗直属支部曾创办平民剧社，每月义演一次，所得款项悉数用于筹赈。所演戏剧大多为富有民族意识的故事，迎合大众趣味，以资宣传。北婆罗洲各埠都有华侨开设的电影院，经常播放一些中国的电影，粤语片居多，国语片也渐渐增多。有关抗战的电影每次上

映，都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每次都座无虚席；其次，通过演讲集会的方式宣传。遇有大型活动，例如华侨社团或华侨学校开会以及其他大型集会时，通过现场演讲的方式向侨胞宣传抗日故事，呼吁侨胞支援中国抗战；再次，通过广播进行宣传。北婆罗洲政府设置有无线广播电台，有时也会播出一些有关中国的节目，邀请侨领或领事讨论中国文化等，虽然规定不能涉及政治议题，但是对听众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方式。卓还来领事曾受邀讲述《中国之建国工作》，收到不错的效果（卓还来1999：99）；最后，通过家庭访谈的方式进行特定的宣传。筹赈会在举行特捐时，会派人挨家挨户上门募捐，在遇到月捐时，则动员全体侨校师生逐户募捐，在募捐的时候宣传抗战，传达最新战况等。

在对外宣传联络方面，主要由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负责。虽然北婆罗洲西方人极少，驻山打根领事馆还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领事馆收到英文的宣传刊物，也会寄送给北婆罗洲政府担任要职的西方人，以争取他们对抗战工作的同情和支持。针对北婆罗洲的日籍侨民，也积极传递日文反抗刊物，对其进行策反活动。在土著民族方面，1939年12月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⁵到南洋各地访问时，到访北婆罗洲，与土著民族会谈，也曾用马来语向土著民族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取得不错效果。（卓还来1999：104）

虽然环境艰苦，客观条件所限，经过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及北婆罗洲各筹赈团体的共同努力，积极宣传，成效颇为显著，在香港出版的《南华日报》和《天演日报》等汉奸刊物均因受到华侨抵制，无人阅读，相继主动停止邮寄。（卓还来1999：99）

五、鬻子救国——山打根华侨郑潮炯的惊人义举

北婆罗洲各地筹赈组织建立后，立刻发动华侨同胞进行捐款。北婆罗洲华侨虽然定居异乡，许多人甚至是当地出生，从未回过中国，但依旧对中国有着极深的感情，对于筹赈活动积极参与，不甘人后。整个北婆罗洲华侨社会，各个阶层均参与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中来，其中也留

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山打根华侨郑潮炯卖子救国的义举了。

郑潮炯1904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大泽区许坑村一个贫困的渔民家庭，1921年前往香港谋生，此后再辗转到北婆罗洲山打根，以贩卖瓜子等小食品为生。“七七事变”爆发后，郑潮炯决定“义卖瓜子”进行筹赈募捐，同时宣传抗日思想。他先在山打根举办了七次义卖活动，共募集捐款350多元婆币，凡是捐款达到一元的，郑潮炯都发给收据，所得款项全部通过山打根四邑公会捐献。（张国雄、李镜尧2015：26）郑潮炯的义举被新闻媒体关注，1939年3月21日新加坡《新国民日报》曾刊登《山打根爱国小贩郑潮炯义卖助赈》一文对郑潮炯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本根（指山打根，作者注）小贩郑潮炯，深明此旨，曾作数度义举。本月五日，适值废历元宵节，该贩于此日作第五次义卖之举，在热闹通衢，向来往同胞兜售，由晨至夕，不辞劳苦，特为祖国伤难请命。查该贩为广东新会许坑人，现年卅四岁，家有一妻三子一女，日中贩卖花生果品为活，虽家境清贫，而对于善举，无不乐为。彼常云：‘我国既决长期抗战，我决长期义卖’。从此语中，可见其爱国之诚于万一也。”

（张国雄、李镜尧2015：24）

1939年郑潮炯的故乡广东新会沦陷，郑潮炯的父亲被日军杀害，消息传到北婆罗洲，郑潮炯气愤难平，为了早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父报仇，在征得妻子的同意后，郑潮炯将刚出生40天的儿子郑社义以80元婆币的价格卖给一位膝下无子嗣的侨商，所得悉数捐献。（陈华炯1999：753-754）他“鬻子救国”惊人义举轰动了整个南洋华侨社会，侨报纷纷予以报道，他的事迹传遍了整个南洋，侨胞们都被他悲壮的举动所震撼，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对他的支持。

1940年郑潮炯决定到南洋各地进行义卖，并沿途宣传抗战，发动更多的侨胞参与到筹赈事业中来。同年10月他从山打根到亚庇再前往砂拉越，沿途受到各筹赈团体及侨胞的大力支持。1940年10月25日，他到达砂拉越

美里，砂拉越美里埠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会长詹少农发布公告，呼吁侨胞支持郑潮炯的义举：

“山打根同胞郑潮炯君……寓根埠经营小贩，曾在该埠义卖七次，总成绩经达根币（即婆币）叁百伍拾余元。最近复将其甫生之第四幼子出让与人，得乳银捌拾元，亦悉数缴交根赈会，转汇助赈。嗣后，舍弃一家数口赖以生活之小贩生意，别离妻子，自备资斧，由山打根出发各埠义卖，不及一月，又得义款千余元，均由各埠赈会直接收解，制发收据，并摄影证明。已树鬻子救国之先声，复作千里义卖之伟举。赤忱为国，竟至如此，殊堪感佩。准函前由，经即集会议决，除定于本日召集各职员协助郑君在本市沿门义卖，并由本会封具赈款箱，直接收款转汇中央外，合行通告周知，希我爱国侨胞本过去出钱出力同舟共济之精神，慨解义囊，共襄伟举。”

（张国雄、李镜尧2015：26）

在砂拉越期间，郑潮炯在诗巫募得义款2212.42元，加拿逸515.9元，桑坡88.5元，加帛681.7元，均交由当地筹赈会转汇。此后他又前往古晋等地，截止1941年5月他离开砂拉越前往星马地区前，在砂拉越共募得国币2万余元。郑潮炯到达新加坡后，受到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接待，并安排他住在孙中山先生曾经下榻过的怡和轩，以示敬意。（马宁1943：115）在新加坡，郑潮炯在新世界游艺会义卖瓜子，仅三晚即筹得国币2000余元。在新加坡的五个月时间里，在新加坡各帮筹赈会的帮助和支持下，郑潮炯共募集叻币4614.59元，其中第二特区募集1544.39元，广府帮募委会筹得1478.2元，南区分会筹得412.25元，海南帮募委会筹得365.27元，第一特区募集252.97元，福建帮募委会筹得217.2元，三江帮募委会筹得217.11元，潮州帮募委会筹得126.2元。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特别颁发义卖成绩表一张，予以表彰。（张国雄、李镜尧2015：28-34）此后，郑潮炯转往马来亚继续募集，先后到达柔佛、吉隆坡、彭亨、雪兰莪、霹雳、登嘉楼、吉打的大小城镇，还曾到达印尼巨港等地，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各地先后沦陷，郑潮炯才被迫中止义卖。

从1937年到1942年的五年时间里，郑潮炯几乎走遍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北婆罗洲及砂拉越各大小城镇，所募集款项总数有说是8万余元，有说是10余万元，有说是18余万元叻币。（张国雄、李镜尧2015：56、58；陈华炯1999：753）有的文章中未注明币种，造成纷扰，有的说是国币，有的说叻币，而按1939年至1941年汇率平均水平，叻币15元可兑换国币100元（陈嘉庚1946：344），综合郑潮炯在砂拉越及新加坡两地所募集的赈款总数以及两地华侨人数，郑潮炯五年间所募集赈款总额应为国币18余万，折合叻币近3万元，这一数值较为合理。郑潮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南洋筹赈活动的发展，他的爱国热情及感人故事影响了无数的侨胞，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六、北婆罗洲华侨的筹赈成效

郑潮炯是北婆罗洲甚至是南洋地区众多参与筹赈运动的侨胞中最特殊的例子，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其他普通侨胞则大多是通过各地筹赈团体，以捐款、购买救国公债、侨汇、投资和捐献物资等方式，从经济上支援中国抗战大业的。募捐活动一般分为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之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等方式。（许云樵1984：47-48）特别捐是指每隔几个月或逢重大纪念日捐赠一次，国内发生重大灾难比如水灾、地震时也可以发动募捐，也可根据特定需要进行募捐，比如劝募寒衣的活动。常月捐是指商行公司以及店员、自由职业者及劳动界等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按月认捐一定数额的赈捐方式，比如一般店员和其他职工，捐出薪俸的10%，厂主、店东视其财力而定，分为十等捐，从国币10元到1000元不等，优等则上不封顶。最常见且最有成效的捐款形式。货物助赈捐即视各自情况捐助物品。纪念日劝捐，顾名思义，即逢重要纪念日时进行募捐。比较常见的纪念日有元旦、新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5月9日国耻纪念日、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8月13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10月10日双十节、10月30日蒋

介石寿辰、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2月25日云南起义纪念日等。除以上方式之外，还有卖花卖物、表演戏剧、举办球赛、游神拜香社戏等宗教活动以及舟车小贩之助赈捐（傅无闷1939：辰185-186），郑潮炯的募捐方式即属于最后一种类型。

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对英属婆罗洲筹赈情况曾有如下记述：

“英属北婆罗洲（陈嘉庚先生此处所指应为英属婆罗洲，包括北婆罗洲、砂拉越和文莱和纳闽），地方颇广，而出产及商业远逊荷属婆罗洲，其较繁盛商埠，只有古晋，其次诗巫（巫）、仙那港（山打根）、纳闽等，俱非大出入之商埠。华侨虽有八余万人，劳动界居大部分。抗战后诸埠亦多成立筹赈会。新加坡召集南侨代表大会，亦派有代表参加，至认常月捐仅古晋、诗巫（巫）认国币数万元，颇能逐月照数汇交。其他所捐无多，且亦不能逐月继续不断。”

（陈嘉庚1946：344）

此一评述有失偏颇，以1938年筹赈情况为例，在当年10月10日于新加坡召开的南洋各属筹赈会代表大会上，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派遣关济川、杨卓生等为代表出席会议（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3：142），报告了1938年度山打根埠的义捐情况：山打根埠人口19000人，义捐国币187800余元，公债国币64500余元，平均每人义捐国币14元（合公债算在内），月捐以后按每月国币10000元计。此外，受亚庇、斗湖、古达等地筹赈团体的委托，关济川和杨卓生等还代为报告了北婆罗洲其他各埠筹赈会的义捐情况：亚庇筹赈会及附近各埠义捐国币160000元，公债30000元，人口共计15000人；斗湖埠义捐30000元，人口13000人；古达埠义捐18000元，公债275元，人口4200人，仙本那埠义捐8000元，此外还有拿笃、东谷等埠义捐的情况。（李文珍1938：24）以上各埠华侨人口总数约为79000人，⁶ 合计义捐国币约652300元，平均每人捐国币8元，而若按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调查统计的58000人来计算，则平均每人捐献国币11

元。北婆罗洲筹赈工作虽称不上亮眼，但也差强人意。砂拉越华侨人数远超北婆罗洲，经济实力也远超北婆罗洲，若加上砂拉越以及文莱和纳闽的筹赈款项，相信英属婆罗洲的筹赈数额远超于此。

实际上英属婆罗洲之所以给陈嘉庚先生造成捐助不多的错觉，源自英属婆罗洲“各地赈款自当地政府施行外汇统制以来，均汇交新加坡汇寄，故新加坡侨捐总数实包括北婆罗洲、文莱、砂拉越各地华侨之捐款”。

（卓还来1999：129-130）而北婆罗洲实际筹赈成效究竟如何，由于北婆罗洲战前的档案资料大多毁于战火，1941年2月20日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代理领事卓还来所呈华侨概况调查报告中保留了部分筹赈统计数据，成为现存可供参考的最主要的档案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管窥1937年至1941年间北婆罗洲华侨的筹赈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卓还来的报告所依据的资料来自于各地主动上报的筹赈统计数据，有的筹赈团体未曾刻意统计，还有的偏远地区的筹赈团体并未与领事馆建立直接联系，亦未统计在内，故这一数据并不完全。

北婆罗洲的筹赈运动受多种因素影响，筹赈成绩参差不齐。筹赈运动最突出、最有成效的当属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和亚庇华侨救灾会。两地均为华侨人数相对较多的大埠，华侨财力也较其他小城镇雄厚，此外，由于分别有山打根中华商会和亚庇中华商会为后盾，商会领袖兼任筹赈组织的领导之职，权力集中统一，辅以领事馆的支持，工作均能顺利开展，成绩和效果也较为理想。而像一些偏远小埠，则完全仰赖筹赈团体领导的个人能力和魅力。其中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由于为首府，离领事馆较近，又为大埠，工作方面较为专业，统计数据也最为详细。亚庇则仅有捐款数目而无具体详细的统计，其他各埠统计信息也并不完整。

（一）东海岸各埠

山打根为东海岸最大的城镇，有华侨近2万人，当时整个北婆罗洲华侨总数估算才58000余人，山打根约占三分之一，侨胞众多，经济也较为发达，故捐款数额也最多。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成立后不久，

即于1937年9月汇出了第一笔月捐婆币30300元，此后基本上保证每月汇出一笔。根据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统计，不包括此次募捐，截止1940年底，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共发起月捐活动158次，共汇出捐款婆币219870.635元，其具体情况统计如下：

表2：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逐月汇出捐款次数及总额一览表
（币种：婆币）

时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月份	次数	总额	次数	总额	次数	总额	次数	总额
一月份			1	5050元	2	3084.4元	5	3450元
二月份			1	5050元	2	600元	6	9300元
三月份			1	2525元	5	8150元	5	3550元
四月份					3	3000元	7	4250元
五月份			2	7575元	5	4500元	5	3350元
六月份			1	3030元	3	3070元	5	3050元
七月份			4	7389元	6	7950元	6	11200元
八月份			3	4795.72元	7	6850元	5	4540元
九月份	1	30300元	4	4770.615元	5	2150元	7	4450元
十月份	1	7575元	3	4454.5元	7	7410元	8	10450元
十一月份	1	5050元	4	5140元	5	3070元	8	3586元
十二月份	1	5050元	2	3000元	5	4990元	6	3112.4元
总计	4	47975元	26	52779.835元	55	54827.4元	73	64288.4元
平均每月	1	11993.75元	2.16	4398.320元	4.58	4568.95元	6.08	5357.367元

资料来源：卓还来1999：105-106。

由上表可以看出，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的捐款总额基本上维持逐年递增的趋势，1939年仅四个月即募集婆币47975元，其中1937年9月份乃初次筹募，华侨财力充实，情绪高涨，捐赠较多所致。1938年及1939年捐赠总额均稳定在婆币53000元左右，虽然每月数额时多时少，但大致维

持在月均婆币4500元上下。到了1939年至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最艰苦的时期，筹赈次数急剧增加，筹款总额也有大幅增加。虽然北婆罗洲人民经过前两年募捐，基本上人人都已尽其所有，但为了中国抗战的胜利，侨胞克服种种困难，省吃俭用，将所有节省下来的财物用于筹赈事业。因此1939年至1940年间增幅最大。

1941年春节，山打根中华商会在山打根发起筹赈义卖春节特别活动，通过举行展览、游艺及义卖大会募集捐款，会期共三天。时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也亲自书写《文信国正气歌》书法一副，义卖助赈。出席活动的有卓还来领事夫妇、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主席丘金钟、西海岸亚庇埠粤籍侨领刘礼、山打根东安公会余瑞泉等，活动由丘金钟主持，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卓还来领事致开幕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侨胞参与度和参与热情非常高。侨商符志光捐献胜利饼三个，由卓还来的夫人赵世平女士剖分进行义卖，共筹得婆币1700余元，折合国币13000余元。此外，还有中华游艺团和华侨瑞狮团两社团沿街舞狮筹赈。此次活动共募得婆币17000余元，折合国币130000元左右。（朱伯江1941）

斗湖为东海岸仅次于山打根的城镇，斗湖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也是采用挂靠在斗湖中华商会名下的方式进行，主席为广东宝安籍华侨林皇荣，他既是斗湖中华商会主席，又兼斗湖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主席，是斗湖万同盛号股东，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兼营港澳银信汇兑，万同盛商号是斗湖的商业巨擘，前任斗湖中华商会主席林云峰也是万同盛商号的股东。在斗湖中华商会的领导下，斗湖华侨筹赈工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从1937年到1940年三年多的时间里，斗湖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共募集赈款婆币45055.77元，其中绝大部分为月捐，共计婆币34284.77元，占捐款总额的76%，剩下24%为特别捐，总额婆币10771元。除去1937年的捐款数，年均捐款婆币13147元。（卓还来1999：107）此外，1940年7月7日，斗湖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在斗湖中华商会会所举办七七纪念及追悼祖国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大会，会场中央设有巨大的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之灵位，同时向侨胞募捐，共筹得国币52327元，经中国银行汇给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赈委会。（林皇荣1940）

仙本那华侨筹赈会成立于1937年底，主席为广东宝安籍华侨卓观养，1941年初改选，潘少廷继任主席之职。卓观养是仙本那县政府公务员，在仙本那税务机关工作，对于筹赈工作十分积极。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仙本那虽然华侨不多，筹赈工作依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共募集婆币8608.5元，其中月捐7215.4元，特别捐1393.1元。（卓还来1999：107）

其他小埠还有西加麦、拿笃、东谷和古达。在西加麦（又称星加唛），烟草种植园的华工们自发组织了西加麦烟园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推举杨三为主席。劳工们本就工资不高，属于挣扎在贫困线附近的社会底层，但在祖国生死存亡之际，他们还是从本就不高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捐献出来，为抗战救国尽自己的一份力。西加麦烟园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所筹款项均为特别捐，1938年共募集婆币1485元，1939年婆币818.16元，1940年为婆币1204.39元，三年共计婆币3507.55元。拿笃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主席为吴奕孚，1939年月捐婆币230.03元，1940年特别捐婆币1764.97元，总计婆币1995元。东谷为北婆罗洲东海岸一小镇，华侨人数不多，1938年组织东谷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主席张廷卓。1938年募集特别捐婆币共计262.35元，1939年为婆币307.6元，1940年为婆币98.05元，总计婆币668元。（卓还来1999：107-108）古达为北婆罗洲旧首府，按照当时北婆罗洲的行政区划，古达属于东海岸省，但从古达华侨救灾会的名称来看，显然古达与西海岸各埠联系更为紧密。古达华侨救灾会的主席为徐辉资，徐辉资为福建永春人，古达新瑞源商号东主，经营布匹杂货。但由于古达曾遭受战火，目前尚未发现古达华侨救灾会的任何统计资料。

以上各埠除古达外所筹赈款均由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为转寄，据不完全统计，在1937年至1940年间，仅斗湖、仙本那、西加麦、拿笃和东谷五个城镇通过山打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汇寄的赈款即达婆币59834.82元，其中月捐41730.2元，特别捐18104.62元。（卓还来1999：108）

（二）西海岸各埠

亚庇为西海岸经济中心，华侨人数亦为西海岸各埠中最多者，募集赈款数额亦居西海岸各埠之首。亚庇华侨救灾会于1937年8月成立之初即发动特别捐，募得婆币20000余元。从1937年10月至1940年10月，发动月捐36次，募集捐款婆币50400元。1939年2月7日，南侨总会发布《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招募汽车修机工和驾驶员，动员广大华侨回国服务。前后共有3192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大部分在滇缅公路上从事军需物资的运输工作，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林远辉、张应龙1991：400-401）北婆罗洲华侨也积极响应南侨总会的号召，1939年6月6日亚庇10名精通机械驾驶与维修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同年8月2日又有21人回国，合计31人，募得婆币2000余元，用于资助31位华侨归国服务。（卓还来1999：108）同年发动寒衣捐，募得婆币7000余元，用于购买棉衣，捐给中国军民过冬之用。1940年4月发动难童捐，募得国币81000元，用于赈济中国受难儿童。同年9月发动卡车捐，募得婆币10000余元，用于购买卡车。先后于1937年12月、1938年4月、1939年2月及1940年2月发起义卖活动四次，共筹得婆币26000余元。此外，还举办义演戏剧、卖花及舞麒麟筹赈活动共20次，募得婆币10000余元。具体情况统计如下：

表3：1937年—1940年间亚庇华侨救灾会筹赈情况统计表

捐款名称	次数	数目	说明
月捐	36	婆币约50400元	自1937年10月起至1940年10月止，适为三年，每月约收婆币1400元，计如上数。
特别捐	1	婆币约20000余元	1937年8月举行。
机工捐	1	婆币约2000余元	1939年6月6日启程10人，同年8月2日启程21人，合计31人，所有费用计如上数。
寒衣捐	1	婆币约7000余元	此为1939年募得的数额，1940年的还在进行劝募中。
卡车捐	1	婆币约10000余元	1940年9月。
难童捐	1	国币81000元	1940年4月。

义卖	4	婆币26000余元	1937年12月1次，1938年4月1次，1939年2月1次，1940年2月1次。
演戏	20	婆币10000余元	除演戏外，连同卖花、舞麒麟在内。

资料来源：卓还来1999：108-109。

综上，1937年至1940年间，亚庇华侨救灾会总共募集婆币125400余元，国币81000元。又据北婆罗洲亚庇华侨救灾会纪念刊第三号记载：从1937年到1941年，仅亚庇一地即汇出赈款婆币168211元。（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3：135）由此可知，1941年间亚庇华侨救灾会至少募集婆币31000元。

其余各埠，华侨人数最多者当属保佛，约有2200人。与亚庇一样，早在1931年保佛埠华侨即成立了名为保佛救灾会的筹赈组织，救济中国灾民。保佛救灾会的主席为粤籍侨胞黄元根，黄元根担任保佛救灾会主席长达6年之久，在他的领导下，保佛侨胞为中国捐输赈济，为数甚巨。（佚名1940：23）1937年8月20日保佛救灾会更名为保佛华侨救灾会，黄元根继续担任主席一职，直到1940年，黄元根响应广东省政府号召，回国兴办实业，才辞去了主席一职，后由广东花县籍客家侨胞钟兆龙接任。1937年8月20日保佛华侨救灾会首次募捐，筹得国币76000元。此后，又发动特别捐，募集婆币6764.06元，1937年12月至1939年11月发动月捐，共收婆币3560.17元，此外，杂捐募集婆币3582.8元，寒衣捐婆币1000元。其属下有王麻骨，王麻骨埠有华侨约350人，华侨救灾会大约成立于1937年9月，主席为广东宝安籍杂货商卓秀。王麻骨华侨救灾会共募集赈款婆币8033元，其中月捐3225元，特别捐4808元。按年份，1937年1340元，1938年1020元，1939年2760元，1940年2913元，呈逐年增加之势。（卓还来1999：110、112-113）

华侨人数较多的其次为吧巴，吧巴埠华侨人数约为2000人，1937年8月吧巴华侨救灾会成立，领导人为侨商马润才，广东五华籍侨商曾耀南是当地首富，亦为救灾会领导人之一。1937年8月吧巴华侨救灾会募捐国币50000元。吧巴埠下属还有京那律和王家湾两小埠。王家湾埠约有华侨500

人，王家湾华侨救灾会也是成立于1937年8月，主席为侨商陈光史。1937年8月捐赠国币15000元。此后至1939年11月间，每月月捐婆币50元左右，均交由亚庇华侨救灾会转汇，募得国币4372.51元，婆币955.78元。京那律埠约有华侨200人，京那律华侨救灾会成立于1937年8月，主席为侨商冯华。1937年8月募集国币10000元，1939年11月又募集赈款婆币595.35元，均由吧巴救灾会代为转汇，此外，还曾委托新加坡《星洲日报》代汇婆币310元，前后一共筹得婆币905.35元，国币10000元。（卓还来1999：51-52、110）

丹南亦为西海岸大埠，该埠约有华侨1500人，1937年8月丹南华侨救灾会成立，主席为福建籍侨商黄玉书。1937年8月募捐国币70000元。（卓还来1999：52、111）1941年9月1日，黄玉书代表丹南华侨救灾会捐献叻币1800元，由星洲中国银行解交香港中国银行再汇给财政部，以供国民政府施振之需。根据当时的汇率，这笔捐款共折合国币15567.57元。1941年10月16日，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回电中予以嘉奖：“（丹南华侨）热诚爱国、踊跃输将，实堪嘉慰。”（《财政部关于华侨捐款问题与北婆罗洲、丹南华侨救灾会等来往文书》1941：9752）

其余皆为几百人不等的小埠，虽然华侨人数不多，但筹赈工作亦不甘人后。古打毛律华侨救灾会成立于1937年10月，该埠华侨人数约为400人，主席为陈家铎，陈家铎为当地侨商，同时也是古打毛律中华公所主席。1937年10月发起特别捐，募集婆币1717元，同年11月，又发动双十节献金活动，募得婆币112.66元。1938年5月募集婆币600元，同年10月双十节献金活动筹集婆币263.26元，12月月捐婆币775元，认购救国公债婆币863.95元。1939年1月春节献金活动筹集婆币123元，6月捐献月捐婆币900元，7月七七献金活动募得婆币829.87元，10月双十节献金活动募集婆币288.53元，11月发起寒衣捐活动，筹款婆币178元，12月捐献月捐婆币700元。1940年4月捐献月捐婆币500元，8月通过七七献金活动筹集婆币611.15元，同年9月发动汽车捐，筹款婆币259.5元，总计婆币8711.92元。孟家达埠有华侨约300人，1937年11月孟家达华侨救灾会成立，主席为侨商曾玉。1937年11月募集国币30000元，至1938年4月又筹得婆币1702.38

元，均交亚庇华侨救灾会转汇。此后又募得婆币3608.5元，直接汇往祖国大陆。打里朴华侨人数约为300人，1937年8月成立打里朴华侨救灾会，主席为侨商张恩崇。1937年8月筹得赈款国币35000元。此外，实必丹华侨救灾会于1937年8月20日募集赈款国币10000元，斗亚兰华侨救灾会于1937年9月3日募集国币30000元。根地咬华侨救灾会于1937年9月15日捐献国币10000元。下南南华侨救灾会1938年12月至1939年11月每月月捐婆币30元左右，共募集婆币915.38元，⁷均由亚庇华侨救灾会代汇。（卓还来1999：51-52、109-112）

综上所述，据1941年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的不完全统计，基于已上报给领事馆的数据，截止到1940年底，北婆罗洲东海岸各埠华侨赈捐总数为婆币299113.75元；西海岸各埠华侨赈捐总数为婆币130600余元，另有国币417000余元，整个北婆罗洲筹赈总额为婆币429713.75元，国币417000余元。（卓还来1999：129-130）此为1941年初领事馆统计所得，而加上郑潮炯所筹得的数额以及前文所述其他途径所获得的筹赈统计信息，则北婆罗洲筹赈总数至少为婆币462513.75元，另有649327国币。

北婆罗洲华侨筹赈工作到底如何，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南洋其他地区捐款的情况，在《南侨回忆录》中有1939年—1941年间南洋华侨捐款的统计表，具体如下：

表4：1939年—1941年间南洋华侨捐款统计表（不包含暹罗）

国家及地区	华侨总人口	每月平均捐款 数额	每人每月平均 捐款数额
菲律宾	14万人	国币70万元	国币5元
马来亚（及新加坡）	235万人	国币420万元	国币1.75元
缅甸	45万人	国币54万元	国币1.2元
荷印	160万人	国币160万元	国币1元
安南	45万人	国币20余万元	国币0.5元
英属婆罗洲及暹属小埠		国币10余万元	
总计	500万余人	国币734万元	国币1.468元

资料来源：陈嘉庚1946：344。

按1939年至1941年间汇率平均水平，叻币15元可兑换国币100元（陈嘉庚1946：344），而婆币与叻币为等值兑换，按此汇率换算后，则北婆罗洲筹赈总额约为国币3732752元，筹赈时间按41个月算，则每月平均捐款数额约为91042.73元，按照当时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的官方统计及估算，1941年初北婆罗洲华侨总人口数约为58000人（卓还来1999：36-37），则每人每月平均捐款数额约为国币1.57元。对比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北婆罗洲华侨的每月人均捐款数额仅次于菲律宾和新加坡及马来亚，略高于南洋平均水平。而根据卓还来领事的报告，在实行外汇管制之后，北婆三邦所筹赈款均直接汇往新加坡，因此新加坡的赈款统计中实际包含了北婆三邦所汇款项，此外，北婆罗洲的数据还是按照不完全统计的结果所得出，此数据并未包含1941年各埠的所有筹赈统计信息，完整的捐款总额比当前的统计总额只多不少。若依此重新估算，北婆罗洲华侨的每月人均捐款数额应与新马地区的不相上下。

七、结论

由北婆罗洲华侨筹赈祖国难民运动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二战前，北婆罗洲华侨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外界想象中那么疏远，北婆罗洲华侨虽然人数不多，但其爱国热情不遑多让，其在筹赈运动中的表现也是值得肯定及赞赏的，北婆罗洲华侨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样心系中国的发展，在轰轰烈烈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运动中亦未缺席，他们中涌现出了郑潮炯这样风靡南洋的英雄式人物，但多数普通华侨则默默无闻地为祖国捐衣捐物，支持中国的抗战大业，虽然筹赈工作存在着一些弊端，但仍取得了足以令人满意的成绩，与新马地区其他华侨众多的大埠相比也不落下风。

注释

1 关于海外华侨与中国抗战的研究现状，可参看刘侃1988。〈近年来有关华侨与抗

日战争的研究概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4: 62-64; 曾瑞炎1990。〈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 56-59; 赵文亮、常县宾2005。

〈20余年来大陆学者关于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评〉。《东南亚研究》6: 71-77; 任贵祥2006。〈10年来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研究述评〉。《安徽史学》6: 118-126; 张秀明2015。〈从“大抗战史观”看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基于《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3: 39-43; 林勇、吴元2015。

〈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文献综述——基于CNKI收录期刊论文(1985—2014)〉。《八桂侨刊》4: 29-36。而反观北婆罗洲华侨筹赈运动的这一主题, 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成果, 仅有部分著作或文章有所涉及, 例如: Danny Wong Tze-Ken 1998.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张国雄、李镜尧2015。《有国才有家——南洋华侨郑潮炯的史诗》(田在原译)。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Danny Wong Tze-Ken 2001.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North Borneo Before World War Two (1937-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2 (1): 93-106等。

- 2 北婆罗洲(North Borneo)的全称为英属北婆罗洲(British North Borneo), 是特有的历史名词, 是英属时期(1881-1963)的官方称谓。由于本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英属时期, 因此除特有历史名词之外, 统一采用北婆罗洲的称谓, 以免引起混淆。
- 3 北婆罗洲是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少有的客家人居多数的地区, 而早期客家人是通过巴色会的安排移居北婆罗洲的,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客家基督徒, 还有一小部分为逃避清政府追杀的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后裔, 这些历史背景强化了外界对于北婆罗洲华侨与中国关系疏离的刻板印象。
- 4 他山俱乐部为亚庇福建龙岩籍华侨建立的地缘性同乡会。
- 5 该团由中国回教协会发起组织, 为抗日战争时期回族同胞进行的一次外交活动, 以期通过“国民外交方式, 联络回教国家, 沟通世界文化”。访问团向南洋当地穆斯林揭露日军在华暴行, 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并进行募捐, 得到当地华侨和穆斯林的大力支持。
- 6 该数据有待商榷, 根据驻山打根领事馆估计, 当时整个北婆罗洲华侨人数约为58000人。(卓还来1999: 36-37)
- 7 原文中数据为91538元, 但考虑到下南南为小埠, 应为笔误, 标错了小数点, 实际数值应为婆币915.38元。

参考文献

《财政部关于华侨捐款问题与北婆罗洲、丹南华侨救灾会等来往文书》1941年10月16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 三(6), 案卷号: 9752。

- 陈嘉庚1946。《南侨回忆录》。新加坡：新加坡怡和轩。
- 陈华炯1999。〈卖子救国的义士郑潮炯〉。载《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下册）。华侨协会总会主编。台北：华侨协会总会，752-755。
- 傅无闷1939。《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
- 《福建党务月刊》1936。〈通令及通告·十五·令各县市党部·总字第六十九号·奉中央秘书处函知，组织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抄发章程办法等件，仰知照〉。5：19-20。
- 福建省档案馆1990。《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北京：档案出版社。
- 冯自由1947。《华侨革命开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3。《北婆罗洲·婆罗乃·砂劳越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 蒋永敬1977。《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
- 李文珍等1938。《南洋各属筹赈会代表大会缅甸华侨出席代表报告书》。仰光：缅甸华侨救灾总会。
- 林皇荣1940。〈海外华侨踊跃向祖国输将：英属北婆罗洲斗湖埠〉。《良友》159：20-21。
- 林远辉、张应龙1991。《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马宁1943。《南洋风雨》。桂林：椰风出版社。
- 《侨务委员会公报》1936a。〈公牍·行政院训令·第三〇九七号令〉。38：42。
- 《侨务委员会公报》1936b。〈公牍·侨务委员会公函·福秘字第一六三一号·函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为据北婆罗洲委士典启华学校汇呈三百十七元七角九分转送察收给据由〉。38：42-43。
- 《侨务委员会公报》1936c。〈公牍·侨务委员会公函·福秘字第一七〇八号·函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为据亚庇丹楠闽南小学校董颜贵受等呈送购机款国币三百元到会希查收给据由〉。39：28。
- 《侨务委员会公报》1937a。〈公牍·侨务委员会公函·宙秘字第三二号·函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为据北婆罗洲亚庇中华商会寄呈祝寿购机捐教国币三千五百元请察收给据由〉。40：29-30。
- 《侨务委员会公报》1937b。〈公牍·侨务委员会公函·宙秘字第一三五号·函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为据北婆罗洲亚庇保佛龙马旦华侨邓永利等呈送献机款四十六元三角请查收由〉。40：38。
- 山打根中华商会2001。《山打根中华商会110周年纪念特刊》。山打根：山打根中华商会。
- 许云樵1984。《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 佚名1928。〈北婆罗洲三打根明新学校助赈演剧会摄影两帧〉。《学生杂志》15（10）：6。
- 佚名1937。〈各地纷请抗敌，并先后成立抗敌后援会〉。《西京日报》1937年7月25

日第2版。

佚名1940。〈般鸟侨领黄元根归国兴办实业〉。《华侨先锋》2（8）：23。

佚名1942。〈新征史料摘述〉。《征集简讯》1：4。

卓还来1999。〈英属婆罗洲华侨概况调查报告〉。载《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

何凤娇编。台北：国史馆，1-150。

朱伯江1941。〈展览游艺义卖：山打根华侨募款救难的盛举〉。《中华》99：15。

朱伯江1941。〈山打根中华商会主持的筹赈祖国难民会〉。《东方画刊》4（1）：28-29。

张国雄、李镜尧2015。《有国才有家——南洋华侨郑潮炯的史诗》（田在原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张元2017。〈叶保滋与东马华人社会的发展〉。载《海外福州人与海上丝绸之路》。

闽都文化研究会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35-141。

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龙岩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同乡会史料专辑）》。龙岩：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央财务委员会1928。〈华侨捐款报告〉。《南洋研究》2（4）：179-186。

Danny Wong Tze-Ken 1998.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of Sabah*.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Danny Wong Tze-Ken 2001.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North Borneo Before World War Two (1937-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2: 93-106.